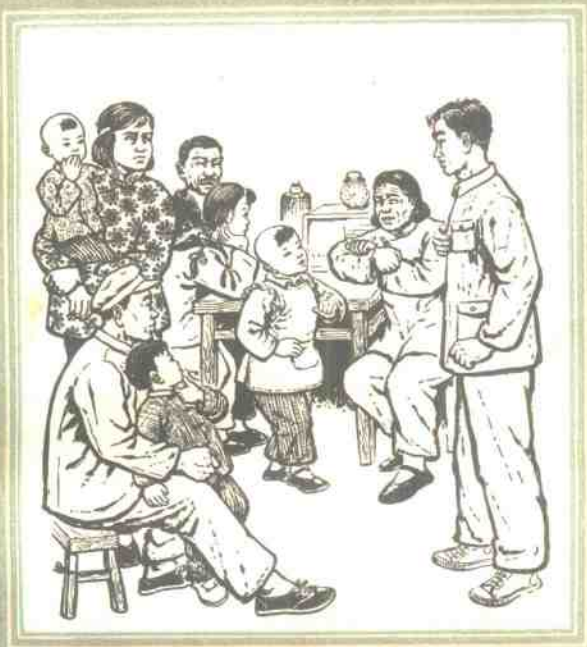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工农家史小丛书 ·

辛酸的历程

651
-1

研究所

辛酸的历程

本社編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63·合肥

辛酸的历程

安徽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$1\frac{1}{2}$ 字数: 21千

1963年12月第1版

1964年1月合肥第2次印刷

印数: 5,001—74,000册

告 讀 者

亲爱的讀者：

今天，我們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幸福啊！这儿沒有剝削、沒有压迫，人們都在不同的崗位上，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辛勤地劳动着。

可是，你們有沒有想到过：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那时候，广大的工人、农民是怎样过着凄惨的生活呢？这些，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广大青年來說，都是比較陌生的；即使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，有的也許漸漸淡忘了吧！

俗話說：知道黃連苦，更知蜜儿甜。只有認清了資本主义制度的丑惡，才能更加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；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，才能对新社会有无比的热爱。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更加热爱新社会，我們打算編輯出版一套工农家史小丛书，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。如有不妥的地方，希望同志們提出意見，以便改进。

編 者

1963年10月

幸 福 的 晚 年

安庆电厂退休老工人 郑本裕

不提旧社会还好，提起旧社会，真是苦水淹心啊！说什么我也不能忘记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带给我的苦难。

父 母 双 亡

我老家是怀宁县高河埠，祖祖辈辈都是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。父亲郑明月在地主家打长工，他当牛当马，一年累到头，受尽了压迫和剥削。

前清光绪二十七年破了圩，庄稼被淹没，乡下没法生活，父亲才带领我们全家来到安庆。那时我只有四岁。依靠父亲当厨子，妈妈和哥哥拣柴、卖花生来维持生活。

我十岁那年，不幸父亲生了伤寒病。穷苦人哪来钱医治，不久他就死去了。丢下妈妈和我们兄妹五个，从此我们的日子更艰难了。妈妈又愁又急，日夜啼哭。谁知祸不单行，后来妈妈也害了病，遍身浮肿，

挨过了两年，疾病也终于夺走了妈妈的生命。可怜我们五个孤儿，最大的哥哥十七岁，最小的妹妹才三岁。妹妹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，我们兄弟三个跟着叔叔过活。叔叔挑水、做小工，家境很艰难，我们只好又离开他家各自谋生。

起初，我在安徽造币厂做了几年临时工。到一九二五年，我开始到安庆电厂做工。从这以后，我前前后后在安庆电厂蹬了三十五年。

旧社会的工厂——人間地獄

說到在旧社会做工，苦处实在說不完。

在安庆电厂里，起初我是个临时工，专门帮助外线工挖洞竖电线杆子。不久又改在锅炉房里挑煤。說是挑煤，实际上象摇車、生火、出煤渣等什么活儿都干。那时候，工人每天一般都要劳动十二三个鐘头，我是临时工，劳动的时间更长，每天都要劳动十五六个鐘头。一天干下来，真累得死去活来。

后来，我被调到锅炉房里生火。生火这项活儿可不简单，锅炉房里那么热，又没有通风设备，上煤时，身前有通红的火炉，背后有滚烫的气磅，人站在中间，烤得浑身发痛。冬天，穿件破棉袄，都汗流浹背，夏天更不用說了。

当然，最苦的活儿还是出煤渣子。

过去，我們电厂在安庆大南門招商局的一間破仓库里，厂房不大，那間渣子房更矮小，只在靠长江的那面墙上开一个小窗口，平时人呆在里面，都感到很闷气。

渣子房没有一点通风設備。夏天出渣子，簡直象爬“火焰山”，那熊熊的煤渣，象山倒了一样从火炉里傾泄出来，火头窜有尺把高，人站在旁边能把身上肉烤焦。資本家只顧賺錢，哪管我們死活，連个口罩、手套都不給买。

把煤渣从炉膛里扒出来以后，来不及等它完全冷却，就忙着一担一担地挑出去。什么时候挑完，才能休息，白天挑不完，夜里也得挑。如果稍一耽擱，就要影响到下一班的作业。

为了使煤渣快点冷却，我們只好在剛出炉的煤渣上潑些冷水，可是，火紅的煤渣經過冷水这一潑，頓時热气象一团濃霧，充滿了整个渣子房，对面看不見人，不仅薰得人火辣辣的难受，炉灰还呛得气都喘不过来。实在熬不住了，就爬在墙上那个小窗口上，把头伸在外面換口气。

因为沒有口罩帶，每次出煤渣时，两个鼻孔都被灰渣塞住了，只好往肚里嚥，一咳嗽，痰都是黑的，

一連幾天變不過來。這樣長年累月地干，哪有個不生病的，不是得了鼻炎，就是害了肺病。解放前，渣子房里有個老工友楊善榮，就是因為多年出煤渣，終於害了嚴重的鼻炎和肺病，又沒有錢醫治，結果就病死了。

安慶電廠是一九〇七年由舒鴻貽、何樹搖、馬伯璠等七個資本家和豪紳合資創辦的，一九二九年改為官商合辦，到一九三七年才全部由國民黨政府接收。廠長起初是李仲明，後來是劉祖輝（是國民黨員）。前後幾十年里，雖然人事幾經變遷，可是，這些官僚、資本家們對待我們工人的惡劣態度，却始終沒有變化。那時，我們工人在政治上沒有一點地位，更談不到有什麼自由。不用說，我們工人是根本沒有資格同廠長說一句話的。按照廠里的“規矩”，我們看見廠長，一定要鞠躬。不僅如此，國民黨、資本家為了“管束”我們，借口說防止工人偷竊，在廠房周圍架起電網。我們每天上下班，都走旁邊一個小便門，狗腿子就坐在門旁監視着。這哪里是什麼工廠，它活象個人間地獄！

談起工人的生活更是和牛馬一樣。除了受國民黨、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以外，還要受封建把頭的欺侮。我的工資是四角錢一天，可是經過封建把頭的敲詐勒索，到我手上只有三角多了。特別是我結了婚，生了

好几个孩子，吃飯的多了，这点工資怎么够維持生活呢？只好飽一餐、餓一頓。有时，我老婆和孩子們挖点野菜，买点粉糠，再向人家要点山芋渣来糊口。至于我們身上穿的，都是补丁連补丁，象一羣叫化子。

記得一九三三年的夏季，有一天，我們工人因为家里穷得沒柴燒，在厂里拣了一点二煤（燒过的廢煤）。这事被狗腿子方积五知道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賴我們偷了厂里的煤，并且勾結国民党反动政府，把我和張玉桂、何启明、何明海、胡荣善等五人抓到伪警备司令部。

我們被抓到那里以后，滿臉凶恶的警备司令徐云鵬，立刻审問我們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他大声向我們喝問着：

“你們为什么要扰乱治安，破坏市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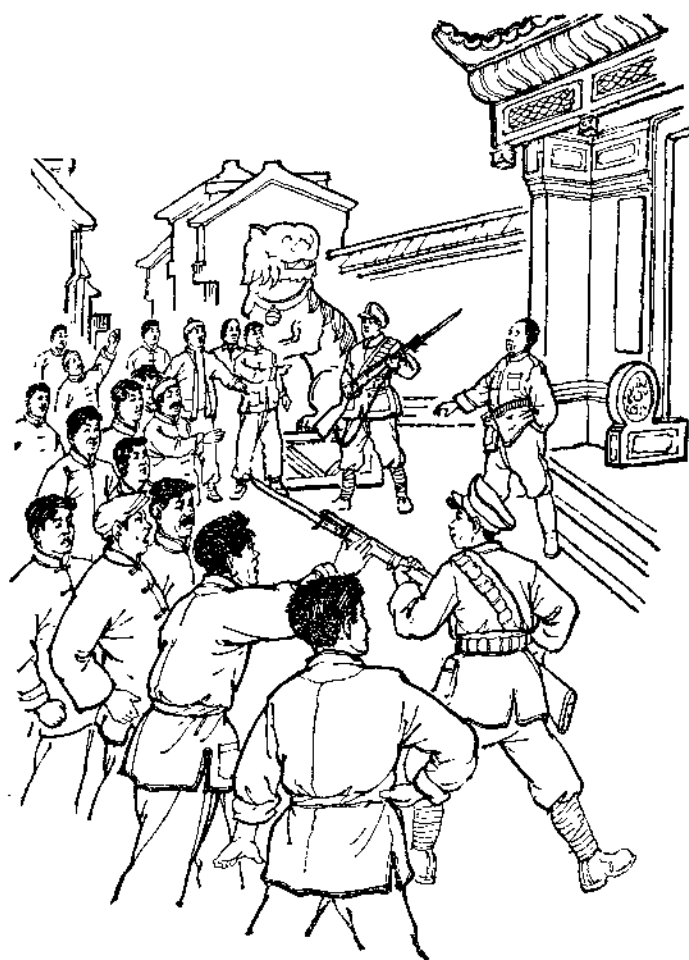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五人也都理直气壯地一齐反問道：

“我們工人沒錢买柴燒，拣了一点二煤，难道就犯了法？”

这一下，可把徐云鵬恼了，他气得象个吹猪的，大叫：

“我看你們都是‘赤化分子’！”

他一面命令几个士兵，用木棍把我們五人打了一頓，接着又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士兵，把我們押送到伪



怀宁县政府的牢房里关了起来。

我們被捕的消息，很快被厂里工友們知道了。他們气不过，一齐跑到伪警备司令部向徐云鵬要人，并且表示：如果不釋放我們，当天晚上就停止发电！这一来，把徐云鵬吓倒了，才不得不把我和何启明、何明海三人放了出来。就这样，我們整整餓了一天。張玉桂和胡荣善两人，却一直被关了一个多月。他們出獄以后，又被資本家开除了。

在日本人的鉄蹄下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。到一九三八年旧历五月，日本鬼子快要逼进安庆了。厂长刘祖輝，丢下我們工人不管，把厂里的現金和貴重物品席卷一空，准备帶着老婆逃跑。这个消息傳出来以后，工友們沒有一个不罵他的。为了向他討几个工錢活命，我和几个工友飯也沒吃，一口气追到北門二里半。可恶的刘祖輝不但不給錢，还把我們大罵一頓，那个封建把头也狗仗人勢，伸手要打我們，我們只好忍气吞声地回来。

那几天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声、大炮声响个不停。安庆城的大街小巷，到处挤滿了逃难的人，你喊我叫，乱哄哄的。这时，电厂已經停頓，工友們都四处逃

散。我也就帶領老婆孩子連夜逃到乡下躲難。

在乡下，我們入地生疏，舉目無親，日子困難到了極點。我和老婆每天挖野菜吃。

就在這時，我老婆生下了第三個兒子。有錢人家做月子吃鷄魚肉蛋，可憐我們窮人連稀飯都吃不上，只能以菜度命。我老婆生產後才三天，就下地挖野菜了，因為產後沒有營養，從此得了一身毛病。而我的第三個兒子落地只七天，因為沒有奶喝，也就活活地餓死了。

一九三九年秋天，我們在乡下實在活不下去，只好又回到安慶。我在日本鬼子經營的一家冰凍廠做苦工。累死累活，一天才掙兩角錢（日本票），只能買一升多米。家里人口多，不夠吃的，就買些日本鬼子吃不了倒在槽水缸里的剩飯吃。這種飯實在難下嚥，里面什麼都有，又酸又臭。我們大人還能忍耐住，孩子們一捧起飯碗可就哭開了。能怪孩子嗎？這的確是有錢人家的豬狗都不吃的啊！

這時候，我的大兒子立才已經十四五歲了，他是一個很懂事的可愛的孩子。他看到家境這般艱難，一天，他不聲不響地拿了一個鉄畚箕和一把掃帚，偷偷地跑到輪船碼頭上掃地下搬運撒下的碎米去了。碰得巧，一天能掃碗把米，要是倒霉被日本鬼子看見了，

不但把扫来的米拿走，还要挨一顿毒打。可怜小立才不知被打过多少次。

我在冰冻厂干了一年多，后来又重新回到电厂。我的大儿子也进了电厂，在锅炉房里跟我学生火。

想起日本鬼子占领那几年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。

在日本鬼子的眼里，我们中国人都是“亡国奴”，打死一个中国人，等于掐死一个蚂蚁！他们烧杀抢掠，强姦妇女，什么灭绝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。

我们电厂靠近长江，煤渣就倒在江边。一天，有一个小女孩在江边拣煤渣，被一个日本鬼子看见了，他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向那个小女孩砸去，说来凑巧，偏偏砸着小女孩的头，血流不止，当时小女孩就哭倒在地。她的妈妈闻声赶来，哪儿敢吭一声，只好眼泪汪汪地把女儿背回家去。因为流血过多，听说没几天，那个小女孩就死去了。象这样的事真是太多了。

我们在电厂里做工，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每天上下班，看见日本鬼子，都要脱帽鞠躬。不然的话，轻的罚站，重的挨打。有一回，我上班忘记向日本鬼子鞠躬，他顺手捞到一把火钩子，没头没脑地痛打我一顿。

在厂里，特别有一个名叫斋藤的日本鬼子，最是万恶滔天。他矮矮的个子，一脸横肉，向天翘着的鼻子下面，留着一小撮东洋胡子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

子手，全厂几十个工友，差不多没有一个不被他打过。

那时候，我們干活一天累到晚，得不到休息，值夜班难免要打瞌睡，可是，如果被斋籐看見了，就一定遭他毒打。有个工友楊吉和，因为好瞌睡，曾被斋籐打过无数次。这个斋籐还經常踮着脚尖走路，贼头贼脑地来到鍋炉房監視我們。所以工友們都叫他“大扒手”。

后来我們比較警惕了，在打瞌睡前，先派人在門口路旁放哨。可是誰也沒想到，有一回，斋籐故意不从大路来，他偷偷摸摸地从江边涵洞里爬了进来，剛好我正在打瞌睡，被他看見了，他哇哇地怪叫，把我痛打一頓。出渣工方在玉，有一次也是因为打瞌睡，被斋籐一脚踢倒在滾燙的煤渣上，斋籐騎在他的背上，两手掐住他的脖子，把他的头和胸部在煤渣上来回地揉，一直燙得他的身子发焦，方在玉痛得大叫。

最令人气憤的是，有时候，日本鬼子为了污辱我們中国人，他們自己不动手打，却要我們两个工友互相打臉，打輕了不算，一直把两人的臉打肿得象个桃子，才讓住手。而他們却在一旁鬻笑。

日本鬼子只知道叫我們卖命，絲毫不重視我們的安全生产。有一回，我剛要下班，突然鍋炉坏了，日本鬼子不等炉膛里冷却，硬逼着我鑽进去修理。这

时，炉子刚熄火不久，热气还没有消除，里边温度很高，明知进去有生命危险，但是身旁站着凶恶的日本鬼子，有什么办法？我只好找来一块木板垫着身子，爬进炉膛里去。谁知当我打开炉门刚爬进炉膛里时，立刻，里面象个热蒸笼一般，炙得透不过气，我头脑昏昏的，浑身汗珠直冒，穿的衣服湿得象水洗的一般，当汗珠滴在滚烫的钢管子上，都吱吱地响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在炉膛里干了一个多小时，才把炉子修理好。等我从炉膛里爬出来时，就一头栽倒在地，昏过去了。

希望变成了泡影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。我满心欢喜，认为这下该有出头之日了，没想到希望又成了泡影。走了日本鬼，来了国民党，抗战胜利带给我们们的，仍旧是无穷的灾难。

胜利不久，刘祖辉又回到厂里当厂长，他的狗腿子也照旧骑在我们头上，剥削和压迫着我们。他们动不动说他们是从什么“大后方”来的，是抗战的“功臣”，而把我们在“沦陷区”里真正同日本鬼子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的人们，看成简直好象仍是“亡国奴”！

一天，刘祖辉来到厂里，这个表面上斯斯文文内

心里却阴险毒辣的傢伙，一眼看見了我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說道：

“郑本裕，你还在这里啊！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。

“那你还記得八年前二里半的事嗎？”

我一听，心想糟了。果然，以后他就处处找我的岔子。那个狗腿子也乘机想捞一把，逼着我給他送彩礼。胳膊扭不过大腿。沒法子，我只好向別人借了几十块钱，在吳樾街頤和园飯館里，請这个狗腿子吃一顿，才算把飯碗保住。就这样，以后逢年过节，不管我手里多么困难，也要想办法給他送点彩礼。

那时候，我們工人的工資很低。工資最多的，每月只有二十元，能买两担米。工資最低的，每月十二元，只能买担把米。可是厂长、資本家呢？他們不劳动，每月却拿到三百多元，超过我們工人几十倍。厂长刘祖輝，他家除了有男女两个佣人以外，还有一个黄包車夫。

在国民党时代，物价飞漲，早上領到錢，还能买担把米，到了下午，就只能买几斗了。而厂里三个月才能“調整”一次工資。有时工資剛領下，轉眼就成了廢紙，真使人哭笑不得！

最奇怪的是，在一九四八年，国民党政府由于濫

发鈔票，币值貶低，印刷好的新鈔票还没有出籠，就变成了廢紙。有一次，他們实在沒法处理了，竟把整箱整箱的嶄新的鈔票，运到电厂燒炉子发电，一直燒了十多天才燒完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我們工人仍旧苦得要命。冬天值夜班，又冷又餓，真不是滋味。为了取点暖，工友們都跑到鍋炉房里睡地鋪，大家叫它“叫化子攤”。我家最穷，全家八口人，只有一条破棉被。值夜班沒有被子盖，我只好爬到一丈多高的鍋炉頂上，睡在烟道上面，身上盖一条破草包。可是这样也不好受，背貼着烟道，燙得难过，身上却又冷冰冰的，冻得要命，而且一觉醒来，遍身都是烟灰，連鼻孔都是黑的。

由于生活的折磨，一次，我病了。我向封建把头要点药吃，他不但不給，还罵我：“死掉活該！”后来，身子实在撑不住，向他請几天假，他不准假，还说什么：“你要干就干，不干就滾！”端着人家的碗，就要受人家管。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，象我們这般穷苦的人，叫天天也不应啊！

欢乐的晚年

自从来了共产党，吹散烏云見太阳。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安庆解放了。从此我才彻底翻了身。